
陳淡而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昭榮*、薛宏甫**

記錄：薛宏甫

時間：2006年4月23日，2009年2月26日，
2010年3月16日、11月23日

地點：高雄市陳宅

陳淡而，台南人，民國十四年生。陳淡而以幽默獨特的風格談及過去的歷史。有著東京高等商船學校傲人的學歷，且在日本時代即已經是海軍預備軍官，陳淡而加入技術員兵大隊後即拔擢為訓練官，成為戰後台灣人中第一位國府海軍軍官。服役時與技術員兵大隊副大隊長阮邵霖及幾位海軍軍官成為好友。二二八時期保護阮邵霖一家人安全，但是他的姐夫王育霖卻被陳儀列為逮捕獵殺對象，命喪二二八；而陳淡而自己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也險繫囹圄。有著中日兩種文化背景，陳淡而對當時國府海軍的情形有其獨到的觀察。訪談中也談及許多台籍老兵懷念的前輩吳振武。吳振武在日本時代即已當上日本陸戰隊少尉，二二八後協助國府陸戰隊的訓練。訪談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這位傑出的台灣人吳振武的懷念。

* 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創會會長

** 文史工作者

兒時記憶

我是台南縣官田鄉人，民國十四年生（西元 1925 年）。我現在還記得以前日本時代官田的地址：台南州曾文郡官田庄官田村三百八十號。以前官田人大都來台南市念書，當時台南州送去日本念書進修大學的人，最多的就是我們官田人。官田地名的由來就是「官賜的田」。我是來台第十一代，我的祖先跟著鄭成功來台灣，聽說母親的祖先還跟著鄭成功進攻過南京城，後來還賜了柳營的地給母親的祖先。

之前我還花了十年的時間收集資料來修我們陳家的祖譜，還叫我台大醫科第二名畢業的孫子幫忙，由我口述，然後他幫我謄寫。以前我們家在官田算是小地主吧，我的老家還有一台以前祖先留下來的洗布機，可能以前也有從事紡織，不然怎麼會留一台洗布機。我爺爺陳人英¹在日本時代做過台南州的參事，做了二十八年，日本人的官階還作到「正三位」²，算是不小的官。以前新來的縣長路過的話，還會過來和他打招呼。有一次他穿著

日本服與木屐坐火車，坐在二等車廂，車長來查票時覺得他的穿著應該是坐三等車廂的乘客，便跟他說他應該坐到後面的三等車廂，因為那裡才是草地阿伯坐的車廂，我爺爺給車長看了車票，才知道我爺爺沒有坐錯車廂。

我五歲時（西元 1930 年）就從官田搬到台南去念書。在官田的事情我大概只記得當時的大地震「嘉南大震災」。³那時全庄的厝倒得只剩下役場，以前的鄉公所叫「役場」，只有役場的屋子沒倒而已。那次地震震了一個多月。以前我家的房子是土角厝，地震時我們家的房子也倒了。

我父親還在時，都有請家庭教師來教家裡的小孩，教《三字經》、《人之初》那些教材，我的兄長都有被教過。到我的時候，因為我父親在我十一個月大的時候（按：西元 1926 年 1 月）就離開了，母親又忙，我有點變成「放牛的孩子」，雖然沒有真正在放牛。印象中都是待在家裡，沒出去和鄰居小孩玩耍。雖然我父親在我小時候就走了，不過父親留下給我們三兄弟的遺產，還可以支撐我們小時候的生活。

後來我們兄弟都去台南念書，我大哥和我差八歲，我是老么，大哥先過去台南念書，住在我母舅家，後來五歲以後我也去台南念書。我那時念的是末廣公學校，⁴是台南最好的公學校之

1 陳人英，字達淇，1860 年生，祖籍福建泉州，世居台南官田。為清朝秀才、廩生。唐景崧撫台時委辦赤山善化里東善化里西三堡採訪局，兼辦籌防局。1895 年清國割讓台灣之初，設案焚香祭祀鄭氏及祖宗，率先向日軍表誠，對於安撫地方有功。1898 年任六甲辦務署參事；1899 年為麻豆辦務署參事兼保甲局局長；1901 年鹽水港廳參事；1904 年任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董事；1909 年台南廳參事；1910 赤山煉瓦會社社長。1898 年與 1909 年分別被授予紳章。（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 年，頁 302）。

2 日本於 1926 年公佈「位階令」，簡化過去的官位的位階排序，新的位階自上至下從正一位、從一位、正二位、從二位，一直排序到正八位、從八位等共十六個等級。因此正三位位於十六個等級中的第五位。

3 1930 年 12 月 8 日與 12 月 22 日台南各發生兩次規模 6.6 的地震，震央都位於新營附近。12 月 8 日的地震造成曾文郡多處地裂噴砂。烏山頭蓄水池之堰堤，倒壞二丈。曾文郡、新營郡、北門郡住房全壞 49 戶，半壞 277 戶，破損 172 戶，磚牆倒壞 165 戶，死 4 人，傷 25 人。12 月 22 日的地震導致台南市路面龜裂、湧出溫泉，水量不多，但仍繼續湧出，新營郡多處山崩。住房全壞 121 戶，半壞 424 戶，損壞 2295 戶，傷 14 人。

4 末廣公學校：為現今之台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1919 年日人於台南

一。那時候日本人念的是花雄小學，台灣人則都念公學校。

在台南念小學時，我一年級的老師是台灣人楊老師，二年級到六年級是日本老師安田實，九州人。他教得不錯，但很兇；左一句「中國奴」、右一句「中國奴」這樣地罵學生。他是九州人，九州人都很崇拜對抗明治天皇的西鄉隆盛。還記得念公學校時日本紀念始政四十周年（西元 1935 年），在台北辦博覽會，我們還去旅行了六天五夜，還去了阿里山、獨立山旅行。



陳淡而先生

孔廟海東書院的校舍成立了台南市第三公學校，1928 年更改校名為台南市末廣公學校。1941 年改稱台南市末廣國民學校、兼設高等科。戰後改稱進學國小。

我滿五足歲的時候就進去公學校念書，可是我早人家一年去讀，卻慢人家兩年畢業。大概每個人的命運不同，我比較不會念書，憨憨的，晚開竅，也沒人教我念書。母親一個人要照顧我們，所以她也很忙，而我也不知要讀書。後來在台灣讀不到理想的中學才去日本讀書。那時日本的中學是初、高中合在一起的五年制中學，我就這樣到日本澀谷去念書。到日本後我和二哥住在新宿的「合宿」，日本所謂的「合宿」就是供三餐的宿舍，不是學校的「學寮」，而是私人的學生宿舍。我住的房子當時樓上樓下總共八間房，當時英文是叫做 apartment。學校離我住的地方大概隔了四站。



1939 年陳淡而就讀京北中學時，學校旅行合影於生王堂

赴日求學

昭和十三年（1938）七月我到了日本，但是隔年三月學校才開學，學校就建議我先去補習。所以我就先到高等小學寄讀一學期，在那裡補習了半年，怕說九月開學後我的程度跟不上。那時日本有現在所謂的初中「先修科」，也就是小學的「高等科」，日本「先修科」的水準很高；我在那裡寄讀了一學期。那時我還不知道A B C，但到那邊就已經開始在讀A B C英文了。

當時去讀書時，一個很疼我的日本老師罵我：「你在台灣念



陳淡而（後排左二）與室友合影於合宿門口

書居然第六十名畢業？我看你不是這樣的人啊！你在台灣上課時都在睡覺？」所以我去日本的時候，心裡很緊張。我一進到日本的小學，就很拼命地念書，看到什麼都覺得新奇。我的日語比閩南語還好，也是念小學時培養的基礎。在台灣從沒在班上當過級長，沒想到在日本上小學後，票選級長時竟被選作級長。後來同時選上級長和副級長，因為重複了，於是又重選一次，後來變成當副級長。

日本的公教人員有分階級，在台灣時我的老師跟校長是「勳八等」，可是到了日本的小學後我的老師是「勳四等」、「勳六等」，階級差那麼多，難怪台灣的老師都窮的好像要被鬼抓去一樣。我在日本的小學時，跟老師說你要是去了台灣，不只當校長。老師說：「我要在東京，才不要去殖民地，頭腦壞了才去台灣。」隔年（西元1939）九月我就到京北中學就讀。這間學校和私立東洋大學是屬於同一個財團。

剛到日本念書的日子，也是蠻有趣的，日子也就一天天過。那時候請家教，一個月要二十元的家教費，而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才三十八塊。日本人也是會請家教來教小孩子，可是一個月二十塊的家教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後來我二哥氣喘須要治療，那些錢就拿去醫治二哥的氣喘，後來就沒有再請家教了。

一到日本，就感覺遭受的待遇跟在台灣不一樣，覺得比較被優待；因為在日本當地受教育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教育的目的是要把你教育成棟樑；而台灣的殖民地教育是要把你訓練成日本人，出發點不一樣。我十三歲去日本念書時，曾經問同學說：「你們長輩是不是告訴你們台灣人是番仔？如果不注意的話半夜會殺死你們？」他們都說沒有啊！長輩是說你們會說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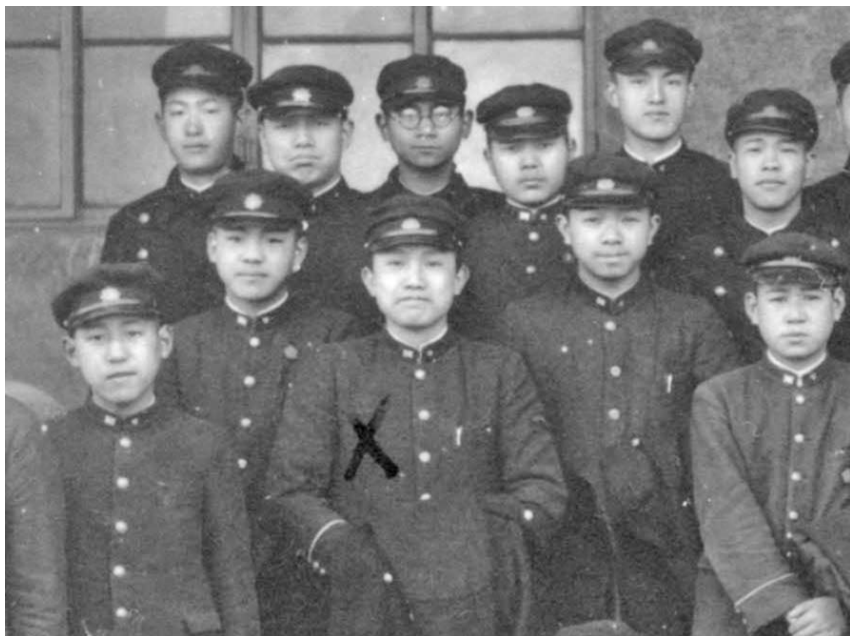
文，和我們念書競爭，長輩反而說要努力學習你們，說台灣人很可取。日本人是一出生就會說日文，我們是一邊念書還要邊學日文在和他們競爭。

當時殖民地教育和日本本島的教育目標差距很大，光是出發點就和人家差了幾萬里，所以教材課本也不一樣。那時在東京念五年制中學，在台灣不敢說的話，在那都敢說了。爲什麼呢？日本古代曾經分成南北朝在打⁵，爲了爭皇帝位，後來北朝贏了，但說實在，正統是南朝，後來日本明治天皇就說了他自己的意見，說：「你們當學者研究誰比較正統都沒關係，但國民已經相信南朝至今，你們現在說歷史忠臣變奸臣，奸臣變忠臣，現在的信仰就讓它是這樣吧，至於你們學者怎麼研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台灣人當時要是在台灣這說，肯定會被抓去派出所打。

（一）「勤勞奉仕」

現在的人說壓克力是戰後才發明的，其實在日本時我就有製

5 日本的南北朝時代，指西元1330年代初期至1392年期間，發生兩位天皇各立南北兩方各稱正統的時代。1331年持明院統的光嚴天皇在鎌倉幕府支持下即位，流亡的後醍醐天皇堅持不退位。1333年大覺寺統的後醍醐天皇滅鎌倉幕府，但倒幕大將足利尊氏有意建立幕府，架空皇室。1335年足利尊氏發動延元之亂，強迫後醍醐天皇退位，另立持明院統的光明天皇，是爲北朝之始；後醍醐天皇被迫退位後設法逃出，持著天皇象徵的三神器復辟，退往大和（今奈良縣）的吉野，是爲南朝之開端。1392年北朝派兵包圍奈良，南朝後龜山天皇將三神器交給北朝後小松天皇，歷時56年的南北朝時代於焉結束。至於兩方何者爲正統，直至20世紀初期，社會黨人幸德秋水被捕後於法庭上提出明治天皇正統性的問題，引起社會公議。明治天皇最後作出結論：以南朝天皇爲日本的正統，北朝天皇保留名號，但不列入正統。



1941年陳淡而（前排中）與同學合影於學校

做過壓克力，日本稱作「有機玻璃」。那時候學生都要被派去軍事工廠工作一個月，在學期中去「勤勞奉仕」- 派學生去軍工廠做工。就是在那時我曾經做過「有機玻璃」。去那裡工作其實很好，因爲冬天很冷，那邊都是暖氣，不會覺得冷。

我們那時去工廠工作是軍部的命令。日本的「文部省」- 就是我們所謂的教育部 - 就會指派我們去工作；學校也就會看要如何安排課程，看是得增課還是減課。我們不是只有寒暑假去，而是在學期中去。所以原本學校安排五個月的課程，就得要在四個月內教完，剩下一個月去工廠作工。所以現在說什麼壓克力是戰

後發明的，但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時候我作工都做到不想再做。

我們作的透明壓克力是飛機駕駛艙要用的，那時的飛機原本裝五毫米的玻璃，戰車裝一吋厚的玻璃。可是使用玻璃的話，如果飛機中彈，因碎玻璃而受傷的人反而比中槍受傷的人還多；壓克力雖然會燃燒，但不會馬上起火，它燃燒的方式和普通著火的方式不同，也比較好滅火。我那時就是到「旭玻璃」⁶這間公司工作，它在日本算是有名的公司，而且這間公司現在也還在。那時一塊一呎四方，厚五公厘，就是一公分的一半，這樣一塊要一百元日幣。那時候一般人一個月薪水差不多四、五十元。一塊尺寸一呎四方、厚五厘米的壓克力就要賣一百元。在工廠時，那時我在搬一塊壓克力，一位平常都在罵人的排長，看到我這個姓陳的拿一塊板子走進去，一句話都不敢說。

那時候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感覺還不錯，比對韓國人好。因為當時台灣人是拿錢去日本當地消費的，是去讀書的，在唸「麥仔酒」大學的（都在喝麥仔酒（啤酒），常常不去上課）。而韓國人是勞動者，清掃廁所，整理水肥。因為當時日本和大陸打了七年戰，國家的狀況已經身陷泥沼、無法抽身。而那時韓國人大都從事清掃工，也沒人給他們小費；日本人覺得韓國人會揩油，因此日本人對台灣人印象比較好。那時台灣人去日本，一般都不是去做工賺錢的。

我現在能想到那時候的兩件事，一個是壓克力，一個就是噴射機的引擎。日本後來做出噴射機了，要量產的時候卻沒有工



左圖：陳淡而於航空研究室第七研究室工作時，與友人一起穿上飛行員制服拍照留念。右圖：陳淡而友人王愛濬（台南人）服役於陸軍航空隊，駕駛「隼」型戰鬥機

廠，不然他已經做出實驗品了。我是沒親自看到噴射機的引擎，是聽同學說的，不過「有機玻璃」的製作我是有親身參與過。我也還做過航空用的油漆；飛機如果在高空飛行，扇葉會結霜，速度就會減慢，所以在尋找不會結霜的油漆，這個我也有做到。可惜那時沒有到作鞋子的工廠工作，有的同學到工廠做軍鞋，如果做一個月，工廠就一人給你一雙。像我們做這種玻璃工廠的也沒有什麼福利。一雙皮鞋那時要兩元，念書的學費要五十塊；一般家庭大概還得小孩去打工賺點學費，不然怎麼負擔得起？

我的生活和當時在台灣台灣人不太一樣。我還去過陸軍航空研究所，這可以說是最秘密的一個單位。高中畢業後，在等待進入東京高等商船學校⁷就讀前，我在那邊服務三個月，一個月

⁶ 旭玻璃，指旭硝子株式会社。是一家日本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製品公司，1907年於日本兵庫縣尼崎市成立。是三菱集團的關係企業之一。

⁷ 東京高等商船學校，為現今的東京海洋大學海洋工學部。前身為1875年

領四百元，（一個月的薪水）就可以繳高等商船的入學保證金。那時光是入學保證金就要四百元，是我自己賺的！當時我也才十九歲。那時我還去過陸軍航空研究所的第七研究室，而第七研究室是專門研究衣服的，隔壁第八研究室是作食料的，當時航空研究所位在東京立川。



1941 年陳淡而與同學合影於學校農舍

設立的三菱商船學校，1882 年改由國家接管後，改稱東京商船學校。1886 年又改稱商船學校。1925 年文部省再改稱為東京高等商船學校。1945 年東京、神戶、清水三間高等商船學校進行整合，改稱高等商船學校，校本部設於清水商船學校校區。1949 年該校改制為商船大學，又於 1957 年遷移校區至東京，改稱為東京商船大學。2003 年與東京水產大學合併，改稱作東京海洋大學海洋工學部。

第七研究所是研發衣服的，有次在基地，和工作的朋友把研究室製作的飛行員飛行服拿來穿，打算拍張照片紀念，結果敢死隊的中尉路過，居然向我們敬禮。我們心裡嚇一跳，這要是被知道是要被處罰的。那些路過的飛行員大概納悶「我們在特攻隊都沒穿過這衣服，他們哪裡拿這種衣服穿？」

我們隔壁是航空研究所的第八研究所，他們在那邊做航空糧食。他們那裡什麼都有，連咖啡都有。有時還跟他們說給我一點嚐嚐。像當時飛機上不能抽菸，有一種口香糖，一片剛好含有兩支菸的尼古丁含量，飛行員可以嚼這種口香糖。還有用雞蛋做的 cheese，就是我們現在吃的起士，我在那時候都吃過。

（二）東京高等商船學校

太平洋戰爭打到第三年（西元 1943 年）的時候，我就都得自己賺錢過活了。到了戰爭的最後大約一年的時間，也就是從投降前一年開始，家裡要寄錢來也都寄不到了。那時寄的信有時還收得到，有的都跟被炸沉的船一起沉到海底了。那時候寄錢不像現在電匯那麼方便。而前兩年（按：1941、1942 年）寄來的錢又拿來治療二哥的氣喘。還好後來（1943 年）我去念商船學校，算是已經給國家養了，因為吃穿都是給國家提供。

中學畢業後，我就去讀東京高等商船學校。那時候高等商船學校等於是現在的大學了。戰後東京高等商船學校也改成商船大學。日本高等商船在那時是世界有名的。像兩次的世界大戰時，日本一千噸以上的商船就有一千艘。日本當時有兩大商船系統，一間是大阪商船的東京高等商船學校，船上的煙囪上是兩條白線上寫一個「大」字；另一間是日本郵船的神戶高等商船學校，

它船上的煙囪塗裝是白底上有兩條紅線。進去高等商船後，我選擇主修「航海」。我那時在高等商船的課程結束了，正要準備實習。雖然我們是商船學校，戰時國家也會把商船徵用，因為軍隊如果沒有商船也無法運送部隊，那些商船光是要運送打仗的砲彈，就已經運到船都快要沉了。所以那時高等商船學校的學生一入學便成了學徒兵，等於是預備軍官，水兵都要向我們敬禮。所以我們學生一入學就已經算是在服軍職了，像我們寄信蓋上軍事郵便的戳印都不用貼郵票，而且一畢業就是現役少尉軍官。

而那時台灣也要開始第一期的徵兵了，而我應該也會被徵召。那時想說要戰死也要當個高級的軍官（海軍少尉）戰死，我才不要當個三等兵戰死。打仗的時候，最危險的地方 - 軍隊 -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為你吃、穿不會有問題，也不會餓死，而且又不是要你去南方孤島征戰。你如果只是當老百姓，老百姓兩手空空也是會被炸死啊。

在商船學校時，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古怪的須藤教授教我們英語。他是天皇任名的勅任教授，憲兵也不能抓他，因為他是親英國派的，憲兵覺得他有思想問題。他喜歡上課時亂聊些有的沒的。英語是我們的必修語言，到投降前一天我們都還在念英文。我知道當時連日本第一陸軍士官學校的必修語言都從華語改成英語；因為他們學了華語以後，到了廣東後才發現廣東人說廣東話，你說北京話也不通，所以後來日本的陸軍士官學校就把必修語改成英語。還記得那位古怪的教授教我們讀《金銀島》這本書，他喜歡講一句話：「我們有大和精神，不會輸啦！」後來學校舉行典禮時，他還穿了一套海軍大佐的衣服來，大家都嚇一跳。憲兵常跑來叫他不要亂說話，他就回說：「我只有在課堂上

講，沒有到外面拿麥克風宣傳。」八月十五日投降，在八月十日時，他說：「今天可能是我最後的課」，因為他用短波聽國外廣播，不知是聽到英國還是美國放送了什麼消息，所以他說可能是我們最後一堂課。同學想說難道我們戰爭打輸了嗎？他說：「哈哈，怎麼可能，我們有大和精神！」

在高等商船學校的同學裡，也有兩個台灣囡仔，一個姓陳，也是航海科的，他回台後繼續進修，去念成功大學的前身。還有一個輪機科的，姓蔡。我在東京還有個同學，是個秀才，讀到東京帝大，一直辦兵役緩征，緩到最後收到紅單了。八月十五日那天他去報到，結果也沒穿到軍服，只吃到一頓飯，第二天就回家去了。我笑他說：「你撿到了，只有你最特殊。」他笑著說他也不知道會這樣。另外我還有一個朋友在陸軍當通訊兵，姓王，後來升做陸軍航空隊的飛行員，陸軍航空隊的敢死隊那時是開「隼」戰鬥機；也是日本突然投降，他也撿回了一條命。

（三）物資吃緊

我們入學時（按：1943年），教官就跟我們說：「這就是現在的局勢，忍耐點吧！當年我們商船在走澳洲線、美國線的商船時，吃飽飯後還有五種冰淇淋讓你選。現在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們只能吃這樣，忍耐吧。」學校的教官跟我們說開戰前，大阪商船噸位一、兩千噸以上的船隻就有四百艘，現在剩四十艘，三百六十艘都沉在海底。

那時的戰局已經對日本不利了。日本大概也是很想和美國講和，但是嘴巴上不能說自己輸。當初一開始要打仗時，日本天皇把那些親英、親美的人都軟禁起來，派秘密警察跟監，不讓這些

人出國，在開戰後看你們這些人要合作還是不要。日本不是一開始就認為自己百分之百會贏得這場戰爭。

後來美軍空襲越來越頻繁。我們學校位於靠近海邊的千葉縣，因此沒有疏開，只有在那邊迎接敵軍的份而已。我那時看到一些陸軍的軍官可憐到只有軍官制服可穿，連配槍佩刀都沒有，有的只能配一把刺刀。我也看過一本書，有的人配的刀還是只有刀身沒刀鞘，就這樣作戰，多慘！後來連學生都要提前入伍去打仗了，那時有些生產的武器品質不好，有人在琉球想要自殺，沒想到因此撿回一條命，自殺時要引爆的手榴彈沒法引爆；因為這樣撿到命的人也有！

戰時整個物資都很吃緊，像中國戰場如果要求過多的油料的話，日本政府也不給。當時日本許多的裝備跟資源都在大陸，來不及支援日本國內。像我的高中同學入伍後沒軍服可穿，到朝鮮的部隊報到後才有軍服可以穿。那時日本國內吃緊，十個城市就一個被轟炸地慘兮兮，一晚空襲就不知死多少人。所以當時日本的生活，因為沒有船了，南方物資也送不到，即使有些產地是在日本，但負責運輸的人員也都被調去當兵，車站員工只剩女的，就連市內電車的駕駛也都是女的。那時民間配給的糧食是一種「膨風豆子」，小小一勺，這一勺的豆子炒一炒，然後一小口一小口配水慢慢地嚼，讓它吸水膨脹，這就是一天的糧食，日本本土那時實在很淒慘。

我們那時在學校吃的，是六分糙米配四分壓扁的麥仔，湯也只是一湯匙而已，菜就是吃菜頭葉，淋咖哩汁，沒魚沒肉，那時能吃這樣就算很好了。有天出去，一個憲兵經過，有個日本太太喊說：「不要打仗了，乾脆當美國人的小老婆好了！」我們跟日

本太太說：「歐巴桑，你怎麼這樣說，憲兵在那邊哩！」婦人說：「我先生死在大陸，兒子死在南方，這個吃奶的孩子明天要喝的奶在哪裡我都還在傷腦筋，沒奶喝就沒有營養。憲兵有什麼了不起，厲害的話就去第一線打仗，不要在這裡耀武揚威。」我就阻止她繼續說下去。那時候說話已經是在看日子了（按：意思是活一天算一天），到這個地步就只能看日了，不是在看月了。

那時日本的大都市，如果行政區是「市」的，十個市就有一個被炸得清潔溜溜。一開始說是為了國家而戰，疏散的難民會優待，後來沒法再優待了，因為通通都是難民了。這讓我想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兩星期我去廈門旅遊時，導遊跟我說江蘇鎮江的人特別厭惡蔣介石，其實那不是蔣介石，而是他的部下做的；蔣介石要撤退時把整個村子圍起來抓壯丁，男的只留下十三歲以下的小孩和老人，其他通通抓走。所以他們連去討海的都是女的，連蓋房子的泥水匠也是女的。

（四）東京大轟炸

東京大轟炸那天是1945年3月10日，剛好是日本陸軍紀念日。美軍B29下午從塞班島起飛，到東京時是晚上十點左右，轟炸到隔天凌晨四點天快亮的時候。所以日本當時在爭取占領塞班島就是為了這個原因，美軍占領塞班島後攻打琉球比較方便。那時日本說盟軍一百三十架B29來轟炸，美國說他們派三百多架，事實上應該有四百架。⁸東京三十區全都遭到轟炸，整個城

8 美軍的紀錄顯示1945年3月9日至10日的轟炸行動出動334架B29轟炸機。

市都陷入火海，光燒死的人就有十萬人，比原子彈還厲害。那時往天空一看，只看到整個天空都是轟炸機，B29 飛在八、九千呎的高空，在地面上看起來剛好是一公尺。我看到一架日本戰鬥機升空去與美國飛機相撞，結果美國轟炸機只有引擎受損，而日本戰機裂成兩半，美國轟炸機還是繼續在飛。我們隔壁有一個陸軍的高射砲隊，日本高射砲最高只能打到八千五百呎而已，美軍看他不爽，丟一個小炸彈炸高射砲，結果他們隔日搬走。我們這些學生笑到不行，想說我們海軍比較勇，我們穿的很單薄地在訓練，他們陸軍穿的很厚很保暖，可是還在那邊喊冷。

我們附近有個陸軍的糧食場，陸軍的人也放著不管，就放著讓它在燒，早知道也去扛幾布袋東西回來吃。那間糧食場被燒得清潔溜溜。空襲過後，附近靠捕蚵維生的漁民，要把這些沒被炸死燒光的蚵仔處理掉。軍隊裡的伙夫就拿這些蚵仔煮稀飯。我在日本還沒吃過稀飯，但是大空襲那天早上卻吃到蚵仔粥，實在有夠好吃。因為出生以來沒吃過日本的蚵仔粥，那天吃到，真是好吃。好笑的是，那天有的作業員很早來上班，去廚房提菜頭湯，提來後卻不敢喝，因為菜頭湯裡面有攪到屍體的碎塊。

我的親戚就說他那時在東京往東邊的海邊一看，房子都被燒得清潔溜溜。那時美軍丟的不是炸彈，丟的是燒夷彈；燒夷彈的材料是看起來很像粉稞的黃磷，超過攝氏三十度就會燃燒。開始轟炸後，大家都沒去防空洞，都跑出來看。現在想起來，那時捲起許多龍捲風，四十五米的秒速，房子燒成火球，火球有差不多一公尺那麼大。我們跑到隔壁看時鐘，十九分鐘就燒完一棟房子。

美軍開始來轟炸的時候，我還在高等商船的宿舍裡。那時我

們就在東京旁，但我們的宿舍沒有被炸到。戰後大概美軍打算利用我們宿舍，所以沒有轟炸我們，應該是打算登陸之後使用。那時美軍沒有破壞鐵路，破壞的話他們登陸之後還要修理。

我們這個社會，有人說凡事都有因果報應，有個阿婆帶著她的孫子，在那邊請我們高等商船的學生救他，有人問阿婆怎麼了，阿婆說這個孩子是前一個媳婦生的，戰時獎勵生孩子，生一個就有補助，老太太和他兒子，續絃的媳婦和新生的小孩和前妻生的孩子一起躲到防空洞裡，當時防空洞的材料不太好，空襲開始了，房子就燒起來，續絃的媳婦叫前妻生的孩子去房子裡面拿東西，老太太捨不得就跟著追出來，才剛追出來，隔壁的房子不知怎麼了，讓防空洞整個陷下去，兒子、媳婦和新生的小孩都死了，只剩老太太跟孫子活著，老太太跪著拜託我們救防空洞的人，可是要怎麼救！已經沒法救了。也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那時候手腳俐落的年輕男子都被召去當兵，留下的也都是跑不了的老人跟小孩。兩周後我去東京找親戚，親戚跟我說：「報紙寫從東京到海邊，連一隻鳥都沒活下來，都燒掉了。」我說：「有啦！我還活著，你看，我還有腳。」那時候我都沒時間擔心我姊和姐夫，⁹沒那個時間擔心。我們在訓練期間，就跟我們說我們要為日本天皇死，一直灌輸這個「死」的價值，只灌輸這種思想和軍國主義的精神。真是要哭也沒目屎，那時我和我日本朋友說，「今天可能是我們人生最後的日子，人生最後到這樣真無聊」。

那時我們東京高等商船學校的校舍也有被炸到。我們還撿了

9 指姐姐陳仙槎和姐夫王育霖。

兩千隻燒夷彈的彈殼。這個燒夷彈母體是由三十六個小單位組成，彈身上面有個螺旋槳，螺旋槳轉到某個程度就會分解變成三十六支，每一支又會變三支，三支丟下來到地面以後會「蹦」一聲，第二個再進六公尺「蹦」一聲，又再進六公尺，這樣剛好是十八公尺。那黃磷很像洋菜，三十度就燃燒，所以你不能揉，掉到屋頂，隨便掉到哪裡都會燒起來。只要周圍的風一吹，很容易就超過三十度燒起來。後來我們沒辦法，就用土掩蓋。那時候我們學校大概也傷亡了兩百人。我們後來撿了約兩千支燒夷彈的小彈殼，人要是被燒到的話就好像人站在燒金紙的金爐裡一樣。後來有人通知我們游到河裡逃走，結果沒想到游到河裡的反而都死了，燒夷彈的煙遇冷空氣會降下來，結果磷火都在水面上。

空襲是三月十日，到了六月十日，東京都還在撿屍體。那些屍體在海浪漂來漂去，漂到了大海，那些屍體你遠遠地就可以辨別是男是女。在水面上女的屍體形狀比較翹，因為女性屁股較大，男的就反過來臉朝下，看到那被火燒的臉上會有三、四種彩色顏色。

美軍倒是很多車站、鐵路、橋樑留著沒炸，因為戰後他們也要用；美軍打算以後使用的建築物都沒炸。那時候丟了幾萬顆燒夷彈，也沒燒到那些建物。光這點就可以看出日本的科技水準和美國是有段差距的。再說，沒有原料和工廠可以生產，這個戰爭你就輸了，而美國那時都還有能力大量生產武器。

大轟炸後，學校沒有停課，從三月十日到八月十五日我們還是繼續上課。人說「三等四翻身」，人生就一場命運，就這樣翻來翻去。在戰時我有三年的時間讓日本政府養，我們高等商船學校還是初學，「初學」就是還沒有實務經驗，我們初學的課程都

修完了，就等著要實習了，這時日本就投降了。真是撿到命，不然我就去做海龍王的女婿了。所以有人丟了神，有人撿到神（按：日本諺語，有的人把丟棄神像，不過也有人撿起神像），我人生最後都遇到了貴人。好在我沒去做水上特攻隊，不然相戰下去，就要做水上敢死隊。

當時日本快要戰敗時，我們成為海軍預備軍官。日本海軍特攻隊的編制是一分隊四小隊，一個小隊十五個人。水上敢死隊的訓練，哪有什麼特殊？奉令叫去你當特攻隊，你叫乖乖去做。聽說後來自殺用的特攻艇還是用美利亞板（木合板）做的，上面裝了飛機引擎。為什麼用飛機引擎呢？那時雖有飛機引擎，但沒有鋁可以作飛機，所以拿來自殺快艇上用。自殺快艇上旁邊有兩支魚雷，前面裝有三千噸黑色炸藥。打算用這兩支魚雷和三千噸的炸藥來換對方一艘敵艦。

結果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八月十六日就發給我們一張車票讓我們回家，怕我們被當作戰犯。日本怕戰後這些年輕世代也被盟軍當作戰犯。軍部戰時的宣傳就說敗戰的話，男人會被抓去闖，女人會被抓去當小老婆。也怕那些訓練去做敢死隊的人被抓，不忍心，就給了我們火車票。拿了車票，坐上火車，我就到我姐疏散的地方。她住在輕井澤的隔壁。

那時我還收到通知，叫我轉學，去醫科大學考轉學考，那間醫科大學還是以前的帝大。我去的時候是臨時學制（戰時的短期學制）的最後一期，再來就又要恢復成原來的學制。戰爭中為什麼有臨時的（短期的）醫學大學？因為七年太長，養成醫生的速度趕不及醫生戰死的速度。有時候整艘部隊坐船出去，一個魚雷打來，整個部隊就報銷了。在日本殖民地念短期的醫學院畢業的

話還可以開業，但在日本本土就不行，還要繼續到醫院實習兩、三年。戰爭期間沒那麼寬裕的時間，如果等七年教育養成一位醫生，那戰地就沒有醫生了。

回 鄉

(一) 乘坐驅逐艦返台

1946年1月我和我姊、姐夫從日本坐驅逐艦回來台灣，那時我們去拜託京都的美軍佔領軍司令克魯曼中將，後來安排我們坐驅逐艦「楨」回來台灣，這艘船之前沒來過台灣。到了基隆港後，看到一些穿棉襖裝的中國兵在訓練，居然同手同腳在踏步。要下船時我姊姊被那些在訓練的部隊嚇到，她說她覺得怪怪的，不敢下船，我姐夫王育霖就說這又沒什麼。那時有個日軍的聯絡官跟我們坐同一班船到台灣。日本驅逐艦的水手看到碼頭上那些同手同腳在訓練的中國兵都覺得好笑，說：「那支那兵怎會同手同腳」，結果那位日軍聯絡官跟他們說：「你們別忘了，我們還是戰輸的一方哩」。結果那些水兵才想說太丟臉了，不說了。當時想說回歸祖國，台灣有一個將來，會有個健全的國家。

後來進去中國海軍後，才知道有些兵是要來接收台灣時才找來當兵的，而且登陸艦靠岸後他們還不敢上陸，怕台灣的日本兵突襲他們，當時陳儀是跟他們說「來，二十塊銀元給你們，來去遊台灣」是這樣子召兵的。也有人是被強抓來的。說難聽點，都是土匪兵，難怪會引起二二八。這二十兩龍銀是阿兵哥自己說的。那時候在中國當兵都是這樣，被抓丁抓到的話就得去當兵，

部隊人數都灌水。比如說這個部隊有四十人，點名時要把阿兵哥叫來翻他衣服上的名字，看看是不是點名簿的名字。不像日本，人排一排後報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排四十個，不是這樣的。

(二) 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

我說個笑話，在日本時本來要去帝國大學讀醫，後來我回來台灣，當時剛光復，凡事都要紅包。台大有讓我去註冊，我想醫生還要念七年，太久了，因為這樣我才加入海軍。林山田博士跟我很好，跟我像親兄弟，後來他跟我說你那時要是去台大，白色恐怖的時候也許你性命都沒了。那時台灣加入國軍的人，比較多是當陸軍。好在我後來是在司令部服務，資料收集比較完整。不然你現在到哪裡找當時第一期技術員兵的證明和資料？台灣人去海軍軍官學校的事你大概要問莊銘耀¹⁰的家人會比較清楚，因為他們幾個人我只有跟郭宗清¹¹比較有接觸，和日本還沒斷交時

10 莊銘耀(1929-2002)，高雄市人。中華民國海軍二級上將。海軍官校41年班(西元1952年畢業)。史上第二位臺籍海軍上將，更是第一位臺籍的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退伍後出任駐日本代表，並在2000年政黨輪替時出任民主進步黨陳水扁政府第一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及亞東關係協會理事長。

11 郭宗清(1927-2010)，台北市人。中華民國海軍二級上將。台北二中畢業、海軍官校39年班(西元1950年畢業)、美國海軍指揮參謀大學。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史上招收的第一位台籍學生，也是史上第一位晉升中華民國海軍二級上將的台灣人，史上第一位台籍上將。曾任國防部聯合作戰訓練部主任、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常務次長、海軍第一軍區司令部司令、海軍艦隊司令部副司令、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助理次長、海軍第151艦隊艦隊長、駐日本國武官、駐埃及共和國副武

他是駐日大使館的海軍武官。

海軍副司令桂永清命令柳鶴圖組織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頭一期一百四十五名，除了我以外，學歷最高的只有高中。那時大家還沒制服穿，還先拿日本海軍下士的制服給大家穿。那時候我記得桂永清命令建立技術員兵大隊，當時海軍司令好像是陳誠，當時柳鶴圖¹²是技術員兵大隊的大隊長。柳鶴圖他留學英國，是輪機的，阮紹霖¹³是副大隊長。最先海軍在台灣還沒設海軍司令部，只是設了個台澎海軍專員公署，那時海軍專員公

官，退伍後曾任世界郭氏宗親會理事長、中華軍史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長、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12 柳鶴圖江蘇省鎮江人，1915年生。1936年自福州海軍校航海科畢，英國皇家海軍大學深造，第二次大戰期間曾以盟邦海軍軍官身份在英國海軍服役，1946年率領伏波軍艦返國。陳淡而訪談中指出柳鶴圖於左營基地服務時曾任台澎技術員兵大隊大隊長一職。1956年2月21日獲美國政府頒發軍官級勳章，以酬謝其在駐美海軍武官任內的貢獻，1958年元旦晉升海軍少將。歷任上海江南造船所總工程師、海軍艦政署長，駐美國大使館海軍上校武官，國防部新聞室主任、國防部新聞局長、殷台造船公司副總經理、外交部駐泰國大使館新聞參事、獅子山共和國大使、駐史瓦濟蘭大使、外交部發言人、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中華民國駐檀香山總領事。1995年病逝檀香山。（姜廷玉、孫阿冰、於華東編著，台灣三百軍事人物，北京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柳鶴圖病逝檀香山〉，《中央日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13 阮紹霖廣東中山人，1918年生。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副大隊長。陳淡而在海軍左營基地服務時的直屬長官。阮紹霖於1985年3月自費刊印回憶錄《懷往憶舊集》，書中表示當初設立技術員兵大隊是由阮紹霖提議，獲上層核准辦理。1970年1月自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助理參謀次長一職調任內政部役政司司長。（〈內部役政司長 阮紹霖昨就職〉，《聯合報》，1970年1月20日，第2版）。

署的司令好像是一個福州人，¹⁴後來才換黃緒虞來，黃緒虞是汕頭人，他說他大正八年從東京高等商船學校畢業，我還跟他敬禮說：「前輩，可以說日語嗎？」他還把我從頭到尾這樣看了一遍。國民黨撤退來台後他沒有來台灣。在左營設海軍司令部做司令官後他又被派到汕頭那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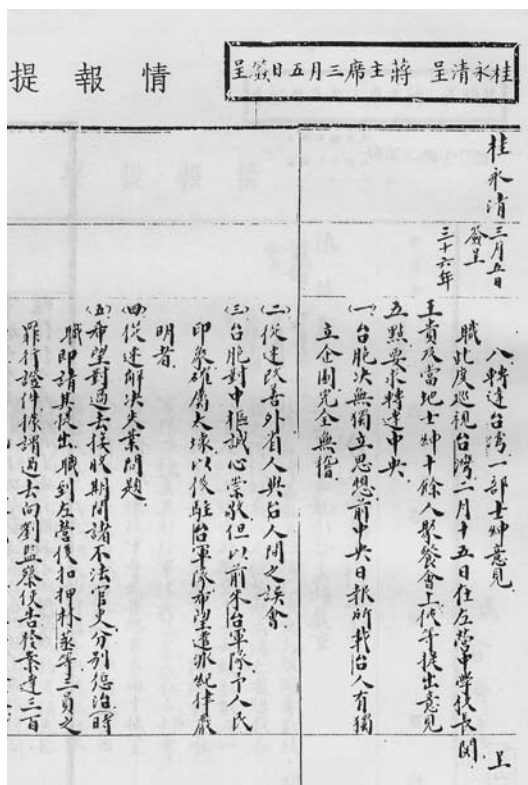
穿著海軍制服的桂永清

（三）桂永清

二戰時中華民國海軍被日本海軍逼的走投無路，中華民國海軍最後跑去重慶，所以那時他們還很看得起日本海軍。桂永清頭一次來台灣時，那時已經準備要送第一批技術員兵去青島受訓。桂永清利用朝會升旗的時候跟這些技術員兵訓話，桂永清就喊「向前一步走」，還喊了三次，那些技術員兵就聽他的口令像前一

14 指戰後來臺接收海軍設施的接收專員李世甲。

步。桂永清就說：「你看看，他們日本的訓練，一步就是一步，你們一步劈哩啪啦，過去啊，我有聽到海軍給陸軍打，沒有聽到海軍去打陸軍，我痛快得很！」結果下面那些福州海軍的都在幹譙「幹、土匪」。桂永清講的「海軍打陸軍」的事情是之前技術員兵學員在左營撞球間和陸軍要塞部隊士兵衝突的事情。我那時是技術員兵的訓練官，所以沒和他們一起去打架鬧事。海軍的人都



在大溪檔案中，桂永清上呈的報告是少數站在老百姓立場、對台灣人友善的報告

說桂永清是個惡霸，本想說這次桂永清來巡視，要讓他罵罵這些技術員兵打架的事，沒想到他還誇講這些技術員兵。桂永清還說雖然日本投降了，可是不是我們贏了日本，是美國贏了日本。

桂永清是陸軍出身，他算還知道一個分寸，他不大穿海軍軍服，都穿陸軍軍服。桂永清還會聽一點台語哩。後來聽海軍裡面的人說他是自殺死了的。聽說他向蔣介石建議放棄金門馬祖，把那些經費拿來建設艦隊，弄艘航空母艦之類的。蔣介石聽了之後大概不高興，把桂永清賜死。這是海軍裡面傳出來的。不然桂永清怎麼會突然就死了。

戰後左營軍港也有一艘跟攻擊珍珠港時使用的同型袖珍潛水艇，裡頭只能坐兩個人，日文叫做「特殊潛航艇」。那時組織和編制還沒建立，不知道那是寶，後來竟然就當破銅爛鐵賣掉了。引起二二八事件的因素之一就是當官的在貪污。貪不夠，這些兵就暴動，引起戒嚴才有機會搶劫，這是中國五千年傳統的歷史。那時候海軍的情報還說共產黨已經有潛水艇，當時民國三十五年日本在葫蘆島移交兩艘潛水艇給中共，還幫他們訓練。當時贏了戰爭後只想到接收時貪污、「歪哥」，因位這樣才會有二二八。

二二八時我們還到我們副大隊長阮紹霖的宿舍保護他，後來阮紹霖打算安置家人到軍港的船上，我們便從他的宿舍撤退。我幫忙隊副提著行李到基地內，走到大門口，平常跟我敬禮的水兵拿著槍對著我喊：「不能進來！再進來我就開槍打死。」機關槍就這樣押下去，水兵對著隊副說：「他台灣人」，我在想他在講什麼台灣人？原來因為我是台灣人，那個水兵說：「台灣人一個都不能進來」。我們的隊部剛好就在司令部對面，中間隔著左營圓環。我要幫他拿行李到司令部，我後來就跟隊副說：「對不

起，行李我就放在這了」。所以我們台灣人要有自覺自己是台灣人，若是沒有就完了。要統一，也好啦！你最好有辦法可以當人家的頭頭，不要反而是被人撿去配（按：任人宰割之意）。後來清鄉的時後，我的兩個小學同學也被抓去槍斃，兩個都讀到大學，一個是師範大學的陳金目，另外一個名字我忘記了。關於二二八的報紙那時我還有留下來，後來怕惹麻煩就又通通燒掉，沒有資料留下來。

（四）派任港務課指泊官

第一期技術員兵在左營受完訓練後，願意接受士官專科訓練的，才送去青島受訓。二二八前，準備要去青島受訓的，都待在左營準備上船。其他留在台灣的第一期技術員兵，就等司令部評估派任。後來左營第三基地司令部改叫第三軍區。那時我已經被派任到港務課任職，所以不用去青島。

我們港務課後來改叫港務組，後來又叫第二組。課長就是我們隊副阮紹霖。在港務課就只有我一個台灣少尉，還有一個廣東人和一個福州人，阮紹霖是我們課長，官拜少校，也是廣東人。那時在基地接觸的都是福州人，不然就是廣東人。最先開始是福州人，後來又派了廣東海軍的來接收，福州海軍的就把業務交接給廣東海軍，後來又來了青島派的。所以我在海軍學的國語都混各種腔調，也不是福州國語，也不是廣東國語。

我也會說一兩句廣東話，「少少啦、知唔知啦」（以粵語發音）。在部隊我不是聽廣東國語，就是福州國語。說難聽一點，民國三十八年，我說的國語還算是很棒的。李宗仁要競選副總統，我聽到他講的國語，我想說我這台灣國語比他的國語講的還

好，他那時講「中華民國副總統」我還聽得懂，現在你們年輕人搞不好還聽不懂他那麼重的口音。

海軍司令部只有我一個台灣囡仔，才作一個小小的少尉軍官而已。後來吳振武也來參加海軍，他來找過我，因為司令部台灣囡仔只有我。我跟吳振武開玩笑說：「振武啊，當初你要打的敵人現在變成你的上司啊！」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就要在台灣開始徵兵時，台灣因為晚朝鮮兩年徵兵，所以後期徵兵的有的當上陸戰隊，然後被派到海南島。戰後桂永清的參謀曹開諫到海南島，大概聽過吳振武這個人，向桂永清推薦吳振武來加入中國海軍陸戰隊。二二八前他就派副官來找他，當時吳振武在台中華師當老師，副官就把名片給他說「有需要時，你拿名片來找我。」後來謝雪紅發起二七部隊，吳振武走投無路了。吳振武就進去海軍，派到左營，要幫他們組陸戰隊。當時的海軍司令部只有我一個台灣囡仔在左營當個少尉小官。當時才二十三歲。

（五）南京公差

在港務課時我有次被派到南京出公差，記得那時蔣介石要競選第一任總統，¹⁵ 南京的旅館老闆跟我說，「陳先生，你哪裡來的？」他看我穿著海軍制服來住宿，對我很好奇。「你台灣來的？」「中國沒有政府喔！」旅館的老闆竟然這樣跟我說。老闆接著說下去：「中國有三匪，你知道嗎？第一是「蔣匪」，收錢的，跟你要錢啦。第二是「共匪」，共匪來，看蔣匪已經把錢都收走了，沒有東西拿就割稻子，稻子也就沒了。第三、「土匪」。

15 蔣介石 1948 年 3 月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

土匪一來，看說稻也沒有了，錢也沒有了，就抓人啦。中國有三匪，有沒有聽過！」

跟我講這個話的是旅館的老闆。他是好奇看到我這個台灣人穿了海軍制服到上海出差。我那時候英語夾雜台語，再加一些廣東話，這樣也可以到處行走啊。

我在港務課的課長阮紹霖，他後來退休後寫了一本回憶錄，也送我一本，你可以拿去參考，他裡面也講到技術員兵的事情。他後來海軍中將退伍，差不多十年前作仙了。這本《懷往憶舊集》是1985年3月印的，上面還有他給我的簽名「淡而吾兄指正」。這書是自印的，沒有公開。如果我沒有拿給你看，你也很



左圖：1949年8月陳淡而與友人張進聰合影留念。當時陳淡而已準備離職。右圖：陳淡而的彩繪半身照

難找到。你看，他（按：指阮紹霖）是總統召見過兩次的人，難道你們是讓他來訓練台灣兵、來反政府啊！政治啊！

（六）好友陳慶堃

後來海軍把第三軍區搬去基隆，因為司令部要設在左營，我便到基隆去了。在基隆時認識陳慶堃，當時他是艦隊單位的，我們這個司令部只是負責行政的，後來海軍只有他拿到青天白日勳章。

他還會跑到我的睡鋪睡覺，他接收美國那些船後常要修理，夏天天氣熱，上班時間就跑到我們那裡睡。慶堃和我就像親兄弟一般。他是廣東人。以前他小時候生病，被一個日本醫生治好了。以前日本佔領廣州時，陳慶堃的祖先曾經跟日本人作生意，他們家對日本人比較了解，所以陳慶堃對日本人的看法和其他人比較不一樣。他那時是開一艘AM海防艦，AM就是Auxiliary Minesweeper，美國製清掃水雷用的附屬艦，可以說是海防艦。

我在基隆時，有次他抓了一條日本漁船到基隆，那時他也幫了那些被扣押的日本漁民。他們抓到越界捕魚的漁船，一般都有獎金，艦長一般都把漁貨拿去賣一賣，錢放自己口袋。陳慶堃對這些漁獲沒興趣，嫌它有臭腥味，叫人把魚賣一賣後把錢分給那些日本漁民。

那次抓到漁船的事情是這樣：日本戰敗後麥克阿瑟重劃領海界線，日本漁船不能越界捕魚，但是他們不過那條線又抓不到魚。那漁船好像是從九州來的，當時是一艘大船帶兩艘小船來捕魚，結果看到海軍的船來抓他們，大船跟一艘小船趕緊跑了，只剩下一艘小船被抓到；好像是在舟山群島那裡抓到的。陳慶堃抓

了之後到司令部交差報告，可是那時我們那組只剩我一個人，他跑來找我辦。當時他是少校，應該找科長辦才對，我說：「你們抓船來交，我哪敢辦。我堂堂一個中尉，你們官階都比我高，司令部哪有可能只剩我一個人來處理這件事？」司令部本來編制含我有五、六個人，組長是上校，可是那時都調去作別的事，陳慶堃說：「沒關係，你簽字就好」。我說：「那哪天不換成我被抓去槍斃！」我們兩個人在那裡開玩笑，一直笑。

我後來就上去那艘漁船，找了漁船船長來問，問他為什麼越界，他解釋說他跟著大船一起捕魚，也不知道有沒有越界，可能是風太強，把它們吹過界。那艘小隻漁船也不小，跟陳慶堃的軍艦噸位差不多。海軍算噸位的方式跟商船不一樣，海軍是船重當作船的噸位，可是商船是用載貨的噸位。陳慶堃把那些漁獲賣一賣，一個日本人都給他們二十塊銀元。當時一雙皮鞋可要一銀元。別人做不到的，他做的到。

過幾個月他又來跟我說：「老陳啊，那些漁民三個月沒上陸了，請求說要到岸上走一走」，他要我幫忙處理。我就跟那些日本漁民說：「我是受過日本教育的。日本雖然戰敗了，你日本人不要因為戰敗了就說話不算話，你們分成兩班，一班八點到九點外出，另一班九點到十點外出。」結果放他們出去不到十分鐘，衛兵跑來說：「艦長、艦長，他們通通跑掉了！」當時軍隊還有情報說台灣深山藏著十萬日本軍，須要加強警戒。陳慶堃看著我說：「老陳啊，怎麼搞得？明天你槍斃、我也槍斃，就這樣算了吧！」陳慶堃居然這樣回我。

我便去船上找船長，可是船上只剩下一個人，後來找到船長，原來是跑去理髮。我問怎麼船員全部都跑掉了，船長說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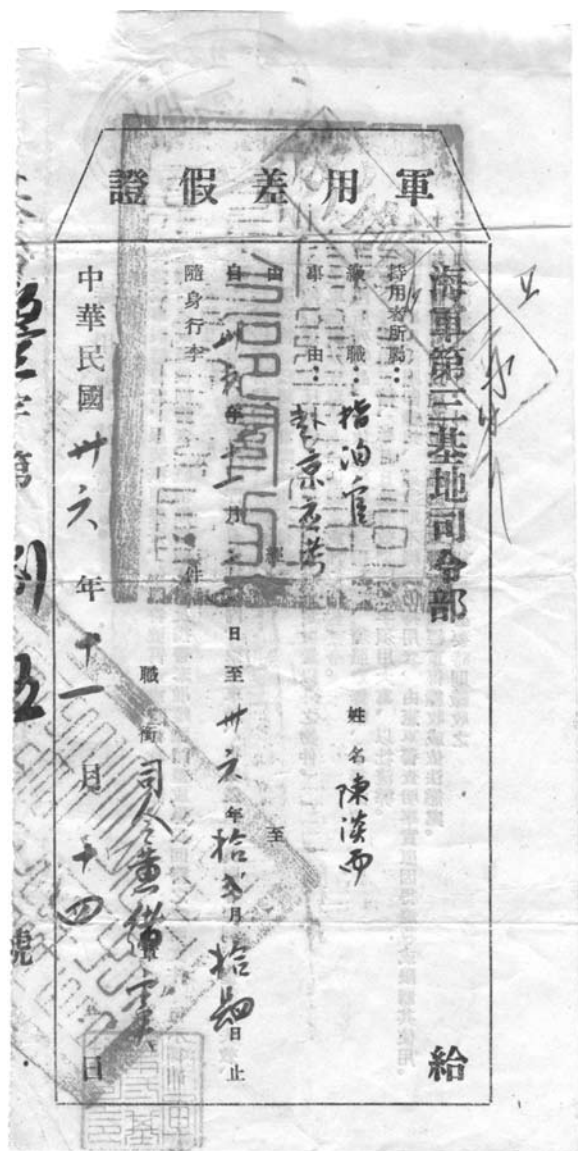
都想要出去，他也擋不住。結果不到九點，衛兵來報告說他們通通回來了，那些日本漁民去買皮鞋和買了些香蕉、米粉吃一吃，兩塊銀元都花不完。又過了一個月後，我出公差到左營，陳慶堃看到我，用日語叫我說：「陳中尉，陳中尉」，說那些漁民差不多再兩個月內可以回去。我說：「很好啊，恭喜、恭喜」。

當時司令部要升我當上尉，但是要加入國民黨，還要我跟課長去海南島考察，可是我不想去。民國三十八年，當時政府要撤退來台時，我在基隆第三軍區司令部，我的其他同事每個都升官了，調走到別的單位，剩下我一個人港務組。後來我看破了，辭職不作了。不然那時被派去海南島考察，蔣介石打算把海南島當作另一個台灣，當作反攻的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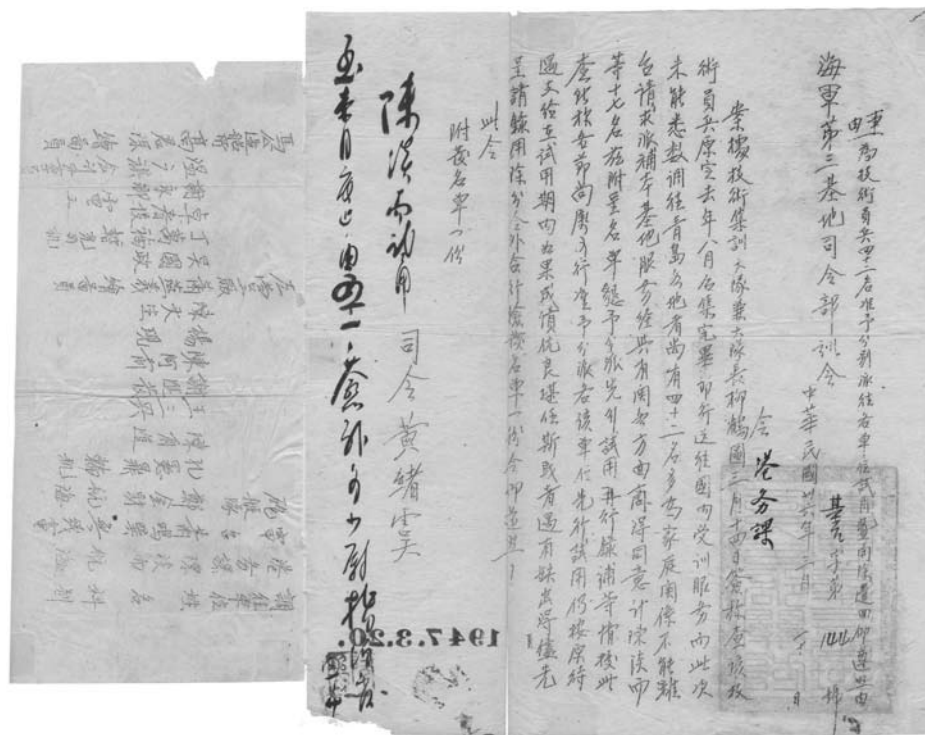
（七）離開海軍

我沒有繼續留在海軍的其他顧慮是：第一，我十三歲就去日本念書，所以語言是一個問題；還有，中國海軍素質跟日本海軍差太多。那時自中國撤退過來，我司令部對面剛好港務局，看著登陸艇載著滿滿一批批逃難的的軍隊，我看了看直搖頭。一艘艘的登陸艇載來滿滿的撤退部隊，全部擠得滿滿地在甲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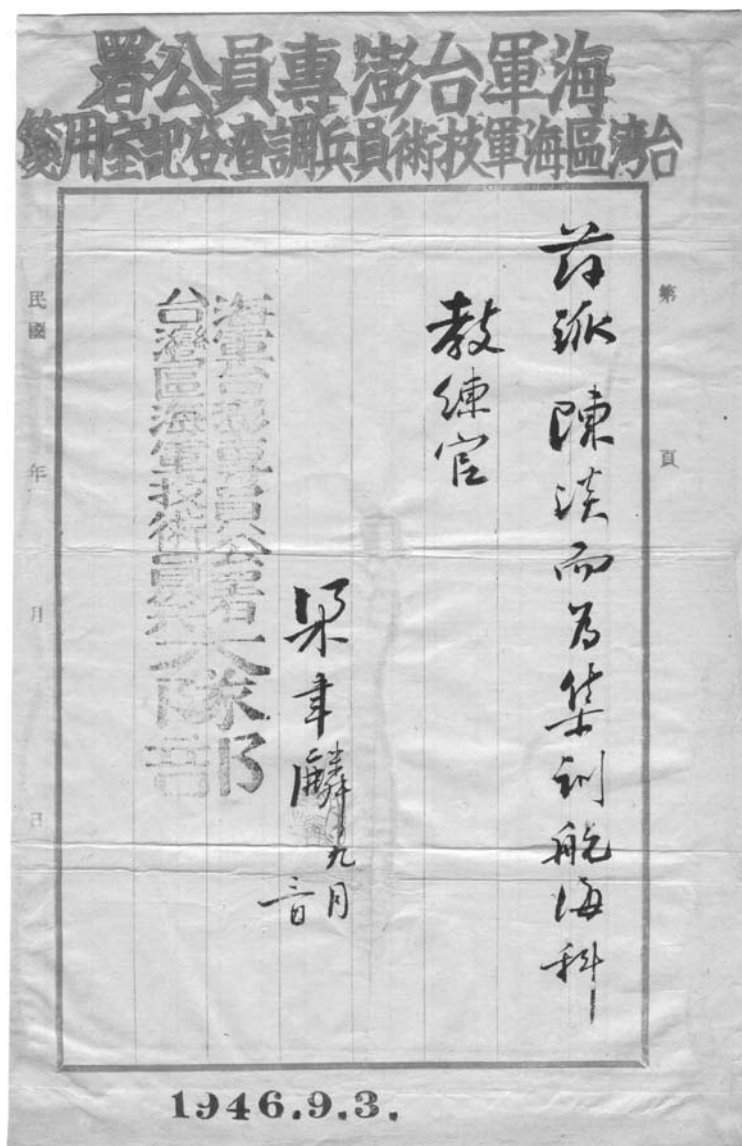
我那時就算留在海軍，前途也是有限。因為你如果沒有再去軍官學校研習班進修，你頂多做到大佐，全世界的海軍都是這樣，日本是大佐，我們是上校。你的背景如果不是正統官校科班出身，很難升上去。而且他們海軍裡面還分好幾派：福州、廣東、青島，分成好幾派鬥來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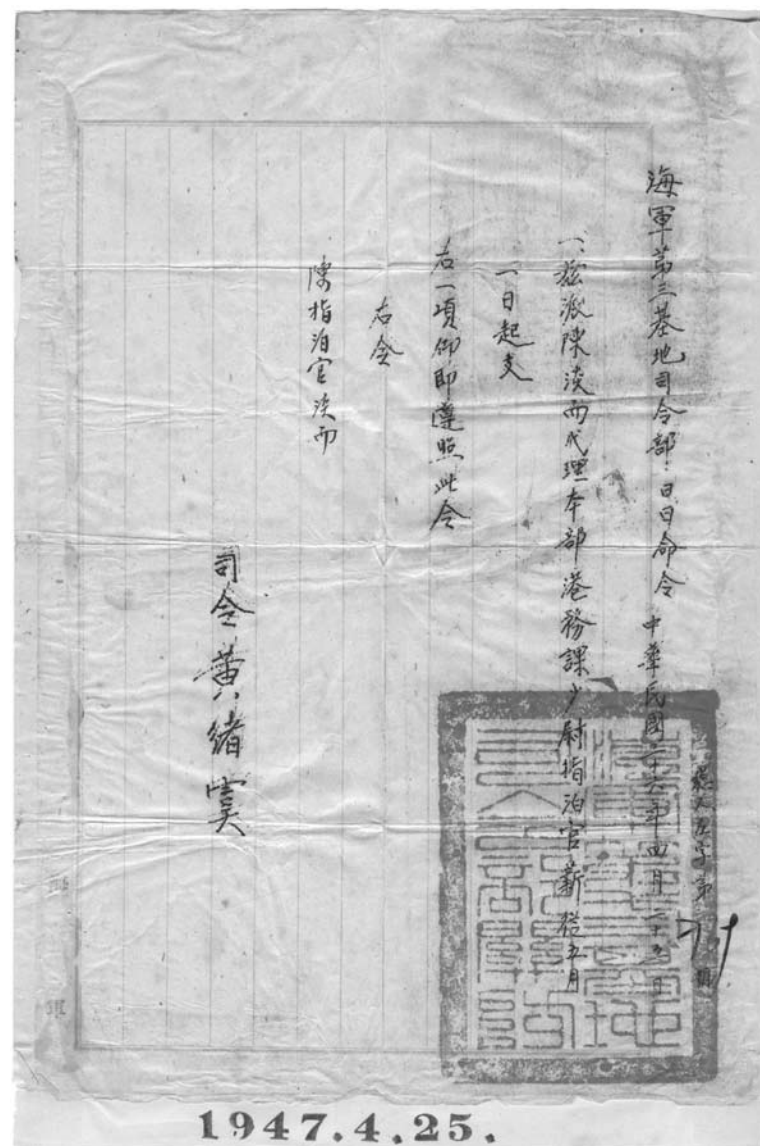
1947年11月陳淡而奉命赴南京公差，此為其軍用差假單



此份派令顯示一百多位的技術員兵有42位無法前往青島受訓，在經過考核篩選後，海軍留用42位學員中的17名，後附調往單位與學員姓名，所調往單位包括港務課、電台、砲艇隊、左營工廠與馬工造船廠



1946年9月3日陳淡而擔任技術員兵大隊航海科教練官的派令



1947年4月25日陳淡而奉派至港務課代理少尉指泊官的派令

（八）回憶姐夫王育霖

二二八時我的姐夫王育霖犧牲了生命，我後來居然還待在海軍，而且沒有死，算是我命好。當時連警官學校的教材，都還有寫王育霖、王育德的事。我說個笑話，東京高等商船怕我們作戰犯，派我到日本的帝國大學去讀醫，可是我還是選擇回來台灣。回台灣以後，當時不管讀什麼學校都要紅包，台大有讓我去醫科註冊，我想了想，念醫生還要讀七年，所以才決定加入海軍。這些事林山田博士都知道，他是我的知己，我們兩個親如兄弟。他說：「淡而兄，你若去台北繼續念台大，可能後來你性命也沒了」。說難聽點，蔣介石的時代我差點被通緝，好險那時候我沒有身分證，不然可能也列為無藥可救的崇拜日本主義者。其實我不是崇拜日本，雖然我是軍國主義時代出生培養出來的，但是我不贊成軍國主義。當時是沒有身分證，沒有什麼制度，不然那時怎沒有要抓我！民國四十年李友邦事件時本來要抓我哩！他們大概會說因為我姐夫和姐夫的弟弟是日本台獨份子的首領。民國三十五年到三十八年，我為了中國海軍沒功也有勞，居然要抓陳淡而。憑什麼理由抓我呢？說有一台灣匪仔的重大組織窩藏在海軍，其中陳淡而掌握一切軍事秘密。

民國四十年，李友邦事件時，那時候本來也要抓我。可是我三十八年就離開海軍了。不過他們也還是照樣想抓我啊。你看，專制啊！中國就是專制啊！這是被放出來的人偷偷跟我說的，他怕我也被抓去。他說我這個日本精神這麼重的，穩死的。

在日本時，我跟我姐、姐夫大概一年見一次面吧。當時從東京坐火車到京都要十小時。如果學校沒放假，也沒時間去找她。

姐姐和姐夫王育霖是在台灣結婚，我也沒有回台灣吃喜酒。他們結婚也是人家介紹相親的。王育霖是小學五年級就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先修科，後來讀台北高等學校，再考上東京帝大。姐姐也在日本念書。我姐夫這個人就是很死忠、很日本精神、很義氣的人。當時戰後在新竹當檢察官卻沒法對付那些貪汙官員，索性就辭職不作了。回台灣後我姐夫曾在台北建國中學教英文，而我在左營，兩人就比較遇不到。

後來我姐姐在東京上課結束了，我姐夫要考檢察官，結果朝鮮人沒考中，台灣人還錄取了。那時檢察官權限比法官還大。那時他們在東京住一年，然後才搬到京都。在東京時我跟姐姐、姐夫也是久久才見一次面，那時候坐車也要坐個四十分鐘。他在台灣作檢察官辦事情，有人拿紅包禮物要拜託他，他會請人家帶回去，如果對方不拿走的話，他直接丟還給他。那些外省人就跟我說叫你小舅子收下來，這樣以後事情才不會影響到你。我姐夫又不是要害死自己小舅子。唉，中國社會！蔣介石一來台灣，把那些本來台灣沒有的大陸壞習慣、制度都帶來了，哪有帶什麼好的制度來，台灣在日據時代的風氣習慣都比大陸的好。

後來聽到發生二二八事件，姐姐一直找不到你姐夫，我就請假衝到台北。那時候他被關在台北的東本願寺。那時想說要如何營救姐夫，說實在，在台灣這些半山仔，當時台灣人看他們官好像作很大，但是他們怕被牽連，就也都不管了。後來白崇禧來台灣，說一切都沒事了，結果那天晚上被抓的人就把他們解決

了，就做仙了。我那個四叔陳天階¹⁶當時是前高雄市長連謀¹⁷的秘書，日本時代是新聞記者，二二八的時候也被抓到高雄要塞，幸好是認識要塞的檢察官，幫他求情，說他沒有參加什麼活動。不然他也報銷了。後來他被放出來，什麼也不敢說，你問他，他

16 陳天階，台南人，約一九〇一年生。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官田信用組合會長、嘉南大圳囑託、後入台南新報，為日治時期台灣人最早一位日文採訪記者。後轉入台灣新民報社本社服務，半年後升任該社嘉義支局長，又二年回本社編輯部。之後承辦大阪經濟新聞多年，又再入台灣日報、台灣新報任編輯。戰後派駐高雄任《台灣新生報》南部分社主任。二二八事件時任高雄市長黃仲圖的機要秘書，是否如陳淡而所說任連謀之秘書尚無法確認。根據謝有用的二二八訪談記錄，軍隊在市府掃射時，陳天階爬上四樓躲藏，被軍人脫光衣服只剩一條內褲，將他押到壽山山腳下。事變後辭秘書職，至合作金庫就職。陳天階於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登載之受難事實為「遭受羈押、遭受徒刑執行、健康名譽受損、財物損失、其他」。(許雪姬、方惠芳訪問：〈謝有用先生訪問紀錄〉，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一三七、一五九；章子惠，《台灣時人誌》第一冊，頁九四；〈審查案件查詢：陳天階〉網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網址：<http://museum.228.org.tw/case.aspx>，檢索日期：2016/11/05)。

17 連謀(1907-1978)，福建惠安人。字良順。福建省立一中畢業後，考進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1929年協助中國國民黨惠安縣黨部進行清黨，1930年兼任縣黨部執行委員。1932年淞滬戰爭結束，任廈門市軍統局站長，適逢「閩變」，乃協助政府軍平定。1935年任軍委會調查統計局隊長。1943年兼財政部緝私署督察長，1944年任財政部川康緝私處少將處長兼軍統局督察主任。1945年10月25日奉派至高雄進行接收工作，並被任命為戰後首屆高雄市長，後因貪汙，而在翌年5月下臺。1948年當選福建省選出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後病逝於泰國曼谷。(《人民導報》，1946年5月30日，第2版；楊壬生，《高雄市志·卷十二：人物志》，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37；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6輯，台北：國史館，2003年，頁310-312)。

也不講。二二八也只有他奇蹟似的活下來。他本人出來後就都不敢講。後來我是笑笑地問他。

當時我衝到台北的時候，有張姐夫寫的紙條送來，說他人在東本院寺，請安心，請想辦法。他寫「請想辦法」我們就知道了。當時他們要殺台灣這些人時大概有個名冊，我姐夫大概被列在裡面。名冊裡面有不少是學者，像林茂生。還有像高雄市參議員王石定，我之前我姐夫小弟的婚宴上遇過他，二二八後有次到高雄，想說到他那跟他打聲招呼，才知道他也遇難了。

時代慢慢改變了，台灣人也知道要回頭去了解自己的歷史了。我雖然無黨無派，有人還以為我是國民黨，選舉時只有新黨不曾打過電話來，我都會說「很好、加油、加把勁就會選上。千萬不要出賣台灣」。說到這個，王育德有本書，你去讀就知道，以前為什麼台灣人不能談到台灣！像我們技術員兵第一期的，到大陸被共產黨俘虜的，說他是國民黨的特務。他滯留大陸寫祖籍時，不敢寫台灣人。台灣人還不能說自己是台灣人。不論在台灣或在中國，台灣人都不能談台灣。台灣人自己要去了解這段歷史。

【附錄】

陳淡而、卓春設、許昭榮對談 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歷史

記錄：薛宏甫

時間：2006年4月23日

從軍過程

陳：那時候（戰爭末期）台灣開始第一期的全面徵兵，我也被徵作第一期。徵兵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服兵役。我昭和十三年離開台灣去日本念書。中學畢業後要進去東京高等商船口試時，別人口試問一兩分鐘，我卻被問了十五分鐘。戰時日本軍隊若沒有徵用這些商船，它也沒有能力運送補給它的軍隊，所以我們一進去高等商船學校就變成日本海軍預備軍官學生。我十三歲就去日本念書，而戰爭末期台灣又開始徵兵，而這個徵兵我也躲不掉。想說既然要死也死作一個海軍少尉軍官，不要去做個陸軍三等兵去部隊給人操。而且戰事也已經進行到這個局面了，所以我就跑去給國家養。最危險

的所在（按：指部隊）就是最安全的所在。我就在東京變成海軍的志願軍官。

許：淡而兄，很難得今天有這個機會，我們都這個年紀了，是不是留一個歷史紀錄給我們後代，請教當時你們第一期海軍技術員兵是如何加入國軍？可否跟我們講解一下。

卓：當時就是政府報紙刊廣告，說前日本海軍服務人員來參加考



左圖：陳淡而翻閱檔案給許昭榮與卓春設瀏覽。右圖：陳淡而回台後於海軍服務時所拍半身照

試。我們都有拿過去日本海軍證件去報名。

陳：那時大隊長是柳鶴圖，副大隊長是廣東人阮紹霖，還有一位福州人梁韋麟，每次口頭禪「這個、這個」。

卓：柳鶴圖他東北人¹⁸，日語非常流利。

許：你們第一期那時有一部份人沒有去青島，原因是什麼？

18 柳鶴圖是江蘇鎮江人，卓春設記憶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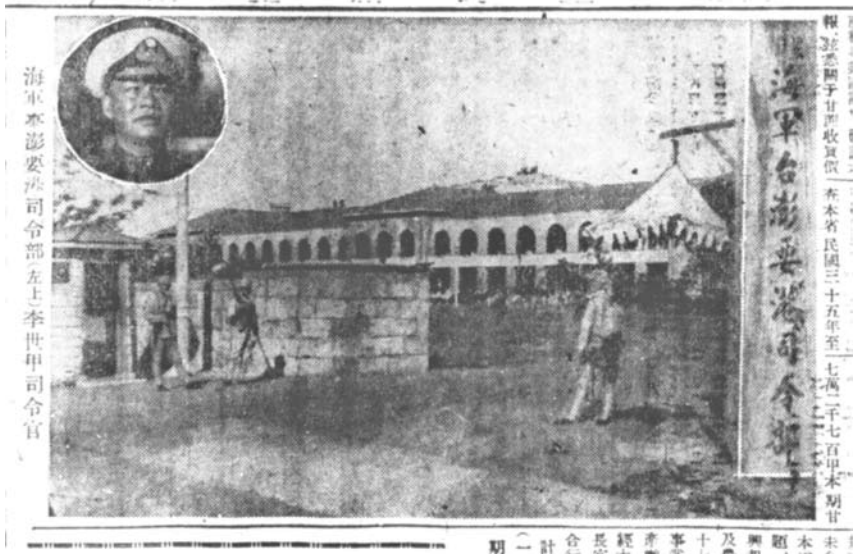
卓：他們有調查啦，看你想要去還是不要去。

陳：選科後，問你是否有意到國內，那時說「國內」，繼續去深造，還是說你想留在台灣服務。

許：原來是這樣才分成兩批。所以留在台灣服務的有四十二人，是嗎？

卓：所以我們就這樣去造船所服務，那時柳鶴圖是造船所所長。

陳：阮紹霖，他廣東人，對我們台灣兵相當照顧，對我們相當愛護。阮紹霖他對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的募集出力甚多，也是這樣後來才有第二期的招募。



戰後初期的左營基地大門，當時門口木牌上寫著「海軍台澎要港司令部」此圖左上角為第一期司令官李世甲（1945年12月8日台灣新生報）

卓：二二八之前，當時我們跟陸軍士兵打架，他還借我們手榴彈跟槍要讓我們去跟他們打。他很為台灣兵著想。

陳：那時桂永清來左營有說，『這件事情有告到國防部，我聽了以後感覺很痛快。為什麼痛快呢？過去我有聽過海軍被陸軍打，但是沒聽過陸軍被海軍打。』所以在國防部裡他說這是軍隊裡面的爭吵啦，小題不要大作。

卓：後來是黃司令來排解才解決的。

陳：黃緒虞。他最後作到少將軍區司令。

許：陳桑，記得去大陸有多少人嗎？

陳：四十二個唷。

許：沒有啦，四十二個是你們留在台灣的。

陳：沒有吧。

卓：那時全部是一百三十幾個。第一期的有的還離開技術員兵大隊不做了。

許：你們在大隊部拍的團體照，我有算你們上面的人數，上面有九十八人。

卓：沒有、沒有。我們有一百多個。我們去大陸的人比較多。

許：我這裡找的資料說留在台灣四十二個。

陳：（翻閱檔案）留在台灣實際上是十七個哩。四十二個最後剩下十七個而已。這十七個是有任用的。

卓：這十七個有任用，其他的就離開部隊回家去了。像我就是留在造船所工作。

陳：（翻閱檔案）這十七個名字都有在這裡。

卓：我有在上面吧，有、有、有。溫仔有在上面嗎？

陳：溫仔，他們暱稱他「小面仔」。

許：謝永卿也有在上面吧？陳天生也有在這上面吧。

卓：陳天生有啦。陳天生後來還當到少尉吧。

陳：鄭金財啦，孔仔，這些都汪精衛偽軍海軍出來的。

卓：孔仔，這個孔仔升到將官哨。

許：他是之前馬公造船所的技術人員嗎？

卓：沒有啦，他跟我們都是第一期海軍技術員兵大隊。

陳：他是汪精衛海軍出來的，他外省人。鄭仔也是外省的，孔仔，溫仔都是外省的。

陳：我在司令部的時候，我有改海軍技術員兵的考卷。有個人在考卷上寫說他有上去「大和」號戰艦。我一看，想說「我的



1946 年海軍台澎技術員兵大隊於國慶日合影

天哪，大和號我都排不到，你說你台灣囡仔上去過大和」。

許：那胡說的啦。

陳：那張考卷我給他五十分。

許：（對薛宏甫說）大和號你知道吧，日本最大艘的戰艦，根本不可能嗎！

陳：大和在琉球那裡被擊沉。沒有航空隊護航，你光一艘戰艦是有什麼用！

卓：那艘船不知道是挨了多少顆魚雷跟炸彈。

陳：英國那艘 Prince Wales 戰艦，日本海軍用四十三枚魚雷去攻擊它，把它擊沉。邱吉爾在國會聽到這個消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說世界海軍我最勇，居然 Prince Wales 被擊沉。

卓：那艘船是被尊稱作不沉的艦艇。

陳：四個月後日本把它打撈起來，還改作戰艦。

二二八經歷

許：可以說一下你們二二八時的立場與經過？

許：陳桑，你還記得當時海軍技術員兵第一批離開台灣是什麼時候？

卓：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哨。

陳：二二八事件進行中，要去青島的這些人就已經被押下去 LST（坦克登陸艇）了。

陳：我不是親自看到的，聽到的是說，LST 駛離左營後，開到基隆，開到基隆外海都浮了許多屍體，看了之後不對勁，才又

開回到左營，等候命令。

許：這些事情過去我都沒有問過周生樟他們，他們被俘在大陸。

卓：周生樟他們在屏東，我們再問問看他們。他們志願去青島的在船上，我們志願留台的不在船上。

卓：二二八事件也經過了幾日，技術員兵大隊隊長柳鶴圖就把我們召集起來訓話，還用日文跟我們說，說你們不要謀反。當時我們在東門那裡，看見一些台北下來的大學生，被外省兵打死，我們大家就很憤慨。但是我們也是沒有莽撞行事。左營一些地方人士說如果我們行動太莽撞，半屏山、桃仔園跟龜山的陸軍會包圍我們，所以叫我們不要衝動，所以我們才



1948年1月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部全體官佐歡送黃緒虞司令調任第四基地合影留念

聚集在左營第三分局旁阮紹霖的宿舍裡保護他。

陳：左營那時就像是鼎底。(鍋地，意指被四面包圍)你龜山與桃仔園這裡都是他們(陸軍軍隊)的。

陳：當時我們大隊副，也就是我後來港務課課長阮紹霖，他寫了一本他在海軍的回憶錄，裡面也寫到二二八他的經驗。裡面有寫到二二八時有人要對他不和，說因為他掌握一批台籍青年。



第一期技術員兵團體照局部放大圖。前排左二為陳淡而。陳淡而因為是技術員兵大隊的幹部，所戴軍帽與海軍軍官相同，與身後學員所戴軍帽不同

二二八的時候阮紹霖的立場很為難。他那時住家在第三分局旁邊，我們學員都去他住處保護他。後來他跟家人要先撤到軍港的登陸艇上避難，我們就從他家撤退了。那時要去青島的台籍技術員兵也已經上 LST（坦克登陸艇）。那艘 LST 的艦長，我記得是個廣東人，我有問 LST 的人，他們說他們怕這些技術員兵學員會衝出來，都把他們關在船艙內，結果他們出來買菜，沒有台灣同仔一起陪，他們不大敢出來，他們有來跟我們聯絡。

那時佔領左營第三分局的台灣人撤退後，我說這是台灣人的悲哀，本來以前還跟我敬禮的衛兵，我本來是要陪同阮紹霖一家人準備撤退進去基地，衛兵指著我說：「你台灣人一個人都不准進來」，機關槍瞄準並且準備要打我。我們課長（阮紹霖）跟他爭嚷，我跟課長說：「課長，我再向前進一步我就死掉了，那對不起，我不進去了，我行李放在這裡，你等一下再來拿。」這就是我當時的眼前的景象。這該怎麼說，我該說我這個中國海軍、或中華民國海軍，還是台灣海軍，「你真的很悲哀」，我那時這樣想。

全國運動大會

許：你記不記得民國三十六年我去青島那一年，中國第二屆全國運動大會，台灣隊就是吳振武帶隊去中國參加比賽的。那時候不論是團體項目還是個人項目台灣隊常常都是拿第一名的，那時中國的隊伍都還很弱，並不注重運動。

陳：我記得是第八屆，那時我也是帶壘球隊去的。那次多好笑！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參加壘球項目比賽，台灣團派了一個捕手和那些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一起去比賽。那些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學的是美國棒球，他們古井的水雞沒見過大海。那時他們棒球比賽一直到第四局還零比零，比賽前我叫他們練習他們不練啦，他們讀官校的學生那時已經拿不錯的薪俸，個個高高在上；結果呢？第四局以後對方抓到投手的球路。我一開始就問他們說你們怎麼只有一個投手，沒有後備的投手？他們說這個投手沒問題，他可以獨撐大局。你們知道他們遇到的隊伍是哪一支呢？上海的黑狗隊，那是日本時代訓練的，他們連術語都用日文講：「選球、偷壘、偷壘、三振、三振」。後來被他們抓到球路以後，結果後來三局被對方得了二十八分，我們在那裡苦笑，旁邊空軍官校的台灣子弟也來幫我們加油哩。我去問他們說怎麼不換投手，他們說投手只有一個啦！他在那裡投球從有力投到都沒力了。每顆球對方也都轟全壘打。

後來第三軍區司令部準備要調去基隆，而左營要留給海軍總司令部用，我就跟著調去基隆了。我那時每天每天看著那些 LST 載大陸撤退來的人。想起那個景象，唉，說實在，打仗千萬不要輸，都是滿滿（撤退）的人擠著站在甲板上曬太陽。那時大陸撤退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快要離開海軍的時候，我薪水大概一個月七萬台幣啦，那時通貨膨脹，才有後來四萬圓換一元。當時菲律賓有人來訪問，你看現在菲律賓來我們這裡當外勞，當時菲律賓在掃地的工友聽說一天薪水美金二元，我海軍中尉哩，掛航海薪哨，約一個月美金七塊，美金

七塊耶！那些菲律賓船員來訪，司令部高級武官都不在，沒什麼人能接待，找我這個破英語的去當「代理司令」。菲律賓的說你薪水這麼少該怎麼辦？我們的人回他說「我們有愛國心啊！」大家在那裡笑的。菲律賓的人就說：「我們那裡掃地的一天美金兩塊哩」，大家在那裡有夠丟臉的。

離開海軍

許：陳桑，你後來在海軍是怎麼離開？

陳：後來我在基隆軍區司令港務組服務，我們課長阮紹霖跟其他長官一個個都高升他調，剩我一個小中尉管理基隆港港務組一切事務。他們要升我上尉，然後要調我去海南島，還要我加入國民黨，我就跟他們說：「再見」。

在日本時代，若我們犯罪，被警察抓到，我們上衣口袋放著一張要被徵兵的紅單，警察賞我們幾個巴掌，之後跟我們說在部隊要努力為國家服務。日本海軍還能跟美國海軍廝殺個兩年吧。日本有大和魂，美國也有美國精神，中國有中國精神吧？國家要興盛，國家的國力我看七八成取決於這個國民的精神力量。你看德國戰敗後復興的這麼快。日本在佔領中國的那十年，有啦，亂七八糟收紅包的事情日本人也是有啦，可是戰後他們馬上改正，說那樣是丟臉的事情，不能繼續犯錯。我們海軍是同一艘船，你輪機我航海，若是打壞感情，廁所也是相遇的到。是我要被你丟到鍋爐燒還是我把你丟到海裡填海？這個軍隊幹嘛還分什麼黨什麼黨？這種作風

不合我的口味。我對我的上司說：「你炸彈丟下來，不管你國民黨共產黨也都是死，你魚雷過來你共產黨國民黨也都是死，有分你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嗎？」我上司聽完說：「老陳你不要再講啦，不要講啦。」

我活到這個歲數，講話也沒有在隱瞞啦。現在在台灣，還是有人想說自己是統治者，你們是殖民地，這樣的心態以我的觀察還是存在。日本時代，欺負台灣人的日本人有，幫助台灣的日本人也有，也有日本人是要打欺負台灣人的日本人。我們這裡不是，二二八之前，這些人就指著台灣人罵「你們台灣人、你們台灣人……。」

白色恐怖險繫囹

陳：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我就離開海軍了。民國四十年李友邦事件時，保密局居然也想要抓我，說有台灣囹仔的重大地下組織窩藏在海軍，其中陳淡而在海軍軍區司令部，一切的軍事機密掌握在他的手中。那時包括吳振武，蔡懋棠，這些都被他們抓去；後來也要抓我哩。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是後來他們有人被放出來說的。

許：是李友邦說的嗎？是李友邦這樣指控你嗎？

陳：不是，是被保密局放出來的人說的。

卓：蔡懋棠後來被槍殺嗎？

許：懋棠沒有被槍斃，他是被抓去關。他後來自獄中出來沒多久就過世了。他就是因為謝雪紅的事情才被關。

陳：他載謝雪紅去大陸。

許：對，他幫助謝雪紅幾個共黨份子坐船從台灣過去大陸。

陳：蔡懋棠他幾個兄弟，一位作省議員，一位參加台灣義勇軍，在裡面是手槍的神槍手，連在飛的小鳥也可以打下來哩。他就是從這裡跟我們大隊副的手下，一個福州人認識的。

令人懷念的吳振武

陳：台灣慢朝鮮兩年開始徵兵，所以台灣沒有第一線的作戰軍官，除了吳振武。吳振武那時是在日本讀高等師範學校，本來去參加志願航空兵學徒兵，結果那時日本已經沒有什麼飛機了，所以才被派去海南島陸戰隊。戰後在海南島時，桂永清大概也去過海南島，可能是透過曹開諫的報告，才聽過吳振武的名號。

光復後，吳振武在台中師範教書，桂永清派副官去台中師範找他；吳振武說我現在執教鞭，所以說讓他再考慮看看，副官給他一張名片，說以後有興趣來報效海軍的話，可以拿這張名片來南京找桂司令。吳振武與桂永清的關係，據我所知，是這樣來的。吳振武後來去國府海軍陸戰隊，兵營也是離我不遠，那時他已經是少校。

許：吳振武那時自海南島回台灣時是中尉。

陳：光復後升上尉，波茲坦宣言的關係，所有官兵都晉升兩級。

卓：吳振武與桂永清認識還有一層關係唷。二二八時吳振武去占屏東機場，本來要抓去南京槍斃，結果白崇禧將軍才去把他

保出來，才把他交給桂永清的！

陳：這我不知道。

陳：我只知道他來海軍組陸戰隊。

許：二二八之後桂永清派他去馬尾組陸戰隊，我就是接到他的信，才去找他。他才跟我說他要去組陸戰隊。二七部隊的部隊長黃金島，他也是海南島回來，跟吳振武去馬尾一起組織陸戰隊。

卓：吳振武他姐夫就是在左營開耳鼻喉科診所，我就是常去那裡看耳朵，所以才認識他。

陳：振武仙不知現在怎樣？

許：他過世了。

卓：什麼！吳振武過世了！

許：他很久以前就過世了。吳振武過世時我在加拿大流浪。我最後見到吳振武的時候是我還在作貿易的時候，還沒去加拿大的時候。那時我有去他家找他，他不在，他老婆跟我說他去附近朋友開的酒吧。我就過去，看到他一個人很失落地在哪裡小酌。

陳：我那時還住在左營時，振武住得跟我很近，那三四年我們兩個都常常作夥，那時他在組陸戰隊爆破隊。

許：他後來的生活也是很淒涼。他後來去他大哥吳振瑞開的一間紙盒公司，香蕉大王吳振瑞是他大哥，他那時去那間公司當經理，我綠島關完剛回來時，在加工區信和公司作經理，我那時一個月都跟他買三萬個紙箱哩。所以跟吳振武算是很熟。之後他跟我以及一位黃醫師彼此常往來；這個黃醫師還在。我後來去加拿大後他也跟黃醫師常連絡。所以黃醫師對

他晚年生活很了解。吳振武他也去南投那裡幫人家種香菇，在工寮幫忙，也曾幫人家作按摩推拿。最後他的死也是…他死後把他的屍體捐給醫學院去解剖做研究。

陳：我跟林山田說，我當時應該不要去海軍，那時候我在日本醫科大學三個月就修一年的書，當時的醫學院不是讀七年，只需讀三年半而已。林山田說淡而兄，好在你沒去台大念書，你若去應該被抓走關起來，你姐夫王育霖在二二八已經喪生，你姐夫的弟弟王育德在日本跟隨廖文毅作台灣獨立運動。你要是到台北你早就報銷了。而我在海軍服務，那時候沒有國民身份證，也沒有任何證件，海軍也不知道你的背景。在民國四十年的時候本來還要抓我，還說一切的軍事秘密都掌握在我的手上，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我覺得笑死人了，當時我們接艦，LST（坦克登陸艇）一小時才跑八海浬，每一艘都是美國送的破銅爛鐵，哪有什麼軍事秘密啦。

許：今天謝謝你。臨時來找你。第一期海軍前輩過去的歷史，都還沒有人訪問記錄過，我常在想要來寫一個台灣海軍技術員兵的由來。我先整理一下，下次再過來好好講一下您的歷史，看幾個人一起訪問？